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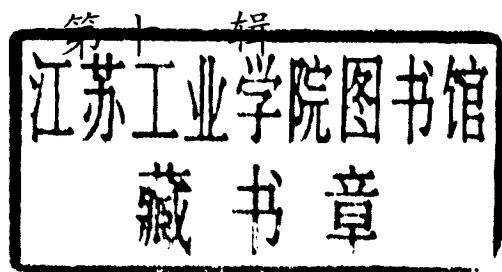


端州文史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肇庆市端州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端州文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肇庆市端州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20001 年 4 月

封面题字 郑 坚
封面摄影 谢子熊
主 编 梁玉麟

端州文史

第十一辑

肇庆市端州区政协文史委员会

1/32 开本 72 千字

2001 年 4 月出版

广东省非营利出版物准印证

〔2001〕粤印准字第 0080 号

肇庆市端州报社印刷厂印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前 言

《端州文史》第 11 辑又与读者见面了。

本辑中的《剧评忆旧录》，记录了八十年代初原肇庆市戏剧评论组的活动情况，既有文采，又有史实，值得一读。

《略谈肇庆古代的钟鼓文化》的作者认为，在始建成的丽谯楼内的大藤鼓是成化二年之后制成的，并指出清代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记为万历年间有误。有待方家进一步考证。

端砚是端州的特产之一，历史悠久。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端砚网应运而生，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端砚网文化方向之探讨》一文，观点鲜明，令人耳目一新。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端州文史》的征集、出版工作，谢谢！

编 者

目 录

前言	编者
张闻天在肇庆	梁汝森 (1)
红旗在肇庆城区升起	梁金明 张 慧 (11)
剧评忆旧录	刘桂旋 (19)
评报话当年	维 荪 (33)
略谈肇庆古代的钟鼓文化	谢子熊 (39)
文博考古琐记 (续)	谢子熊 (50)
日寇空袭肇庆罪行记	谢子熊 (64)
端州与包拯	林以森 (69)
羚峡古道	林以森 (88)
端州区机械工业发展概述	刘桂旋 赖志华 (94)

从政之道德为先	陈立民 (103)
肇庆第一个游泳池 (场)	陈立民 (109)
略谈肇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 和重要贡献	刘伟铿 黄思源 (111)
端砚网文化方向之探讨	黄小红 (137)
试谈传统民俗文化的开发与利用	黄小红 (148)
白沙龙母庙广荫牌坊与龙母亭	封面

张闻天在肇庆

梁汝森

张闻天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中共党内较长时间的最高领导人，曾在党中央负总责（即总书记）。他在“文革”期间在肇庆居住长达6年之久。

一、中共较长时间的最高领导人

张闻天1900年8月生于江苏省南汇县朱家店北之张家宅（今属上海市浦东区川沙县）。1919年，张闻天在南京参加五四运动，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1920年赴日本留学，1922年又赴美国留学，1924年回国后，任中华书局编辑并从事教育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他受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毕业留校任教，1928年9月进入红色教授学院继续深造并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些工作。1931年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

部部长，主编党的刊物《红旗》、《斗争》。1933年1月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2月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出席遵义会议，2月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负总责，至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止，张闻天在中央挂总书记职（即负总责）近8年之久。

二、在肇庆期间的高风亮节

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闻天带着他的伴侣刘英以及养女小倩、厨师黄关祥，于1969年10月下旬被遣送到肇庆，住在军分区驻地龙顶岗西南侧牛岗的一所平房里，从此被弃之一隅，在偏僻山岗上开始了“流放”生涯。

张闻天在肇庆期间化名“张普”以示自己永远是个普遍劳动者。的确，他处处以一个普通劳动者严格要求自己，艰苦朴素，克勤克俭，表现了既是一个革命理论家，又是普通劳动者的高风亮节。

张闻天在肇庆期间，给人们最深刻的感觉就是平易近人，毫无架子，生活俭朴，严于律己。为了保密，警卫员随他散步要穿便衣。他考虑战士钱少，便

把自己在国外当大使时用的一件毛料衣服送给警卫员小柴。警卫战士小黄要复员了，他买了个长江牌半导体收音机送给他，并嘱咐他要经常收听广播，关心党和国家大事。保卫科副科长陈崇茂到罗定任职，他和刘英一道不顾年老多病，步行两里多路到他家为他送行。逢年过节，军分区慰问老同志，也给他送去一份慰问品。他总是说：“我是普通老百姓”，便婉言谢绝。

在肇庆酒厂参观时，厂领导拿出两瓶出口特产龙虎凤酒给他回去品尝，补养身体。他说：“我不会喝酒”，谢而不受。张闻天已年逾古稀，又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当时市面上的柴煤紧缺，冬天为了御寒，防止感冒，家人给他买了电炉，市委领导派人给他安装了，他要求一定要收费。同他一起过组织生活的市委办公室廖锦超同志对他说：“我们已经办妥了。”他说：“我是普通劳动者，我不能特殊。”过后，他写信给廖锦超并转市领导，要求一定要将安装和使用电炉的费用计算清楚，由他本人负责，并交带随来肇庆的厨师黄关祥如数付清。等黄关祥师傅回报已经办妥，才放心下来。廖锦超感动至深，一直保存着这封见之于张闻天克己奉公，不以权谋私，以普通劳动者自律的亲笔信。

张闻天的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并非是因为身处逆

境而出于无奈。生活俭朴、克己奉公，是他平素特色。不管是战争年代身居要职，还是建国后安享太平，他都以人民公仆自命。他有一句至理名言，那就是“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即使到了外国当大使时，他也保持中国劳动人民的本色，给苏联朋友留下了“有知识而无架子”的深刻印象。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以权谋私。在外交部当领导时，总务司的同志要给他更换一套较大的房子，他坚决回绝。五七年精简机构时，他让女儿从外交部调回工厂。支援边疆建设时，他又让儿子到新疆劳动，一去10年。

“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斜”，这是他在延安任中央马列学院院长时，给学生的题词。他不但这样诲人，而且以此律己，不论是在顺境之时，还是在逆境之中，都以此作为人生坚意笃行的信条。在京时，张闻天曾被林彪、“四人帮”残酷审讯，威逼张闻天为他们制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历史冤案作假证词。张闻天到了肇庆，远离林彪、“四人帮”的腹地。可是到肇庆不久，康生曾两次派人来对张闻天恫吓说：“应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暗示他出具假证明，令当时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证明61人的出狱未经中央批准，是叛徒行为。张闻天大义凛然，不畏高压，如实地写出经他本人同当时中央几位主要领导

同志商量，授意 61 人出狱的真实材料。批驳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历史冤案，澄清了史实，挽救了一大批革命元老。

张闻天在肇庆期间，由于“九一三事件”和邓小平复出，政治形势有所好转。形势的好转也给张闻天带来一定的受益。他恢复了党籍，补发了工资。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将这件事告我儿子。”工作人员问为什么？他说：“年轻人要艰苦锻炼，不要乱花钱。”工作人员说：“你的钱花不完嘛。”他说：“将来好交给党啊。”张闻天一生生活俭朴，存下 4 万多元的稿费和补发的工资。后来，在他病重弥留之际，把爱人刘英叫到床前，千叮咛万嘱咐地说：“我死后替我将补发的工资和冻结的存款全部交给党。”还要她写下保证并签上字。刘英与张闻天在千难万险的长征中建立了爱情；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生死与共；在大祸迭降的逆境中相依为命。张闻天难道对自己的爱人还不够信任吗？不！这正是他对党比对自己爱人更信任。他去世后，刘英按张闻天的遗愿，将留下的 4 万元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为张闻天最后一次党费。刘英自己又拿出 4 万元捐赠给中国儿童基金会，以支持儿童福利和教育事业。他们的拳拳之心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对党组织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三、他的“肇庆文稿”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

张闻天在肇庆期间留给人们的记忆主要就是读和写。他平素没有他好，就是喜欢读书。他每隔三两天就要到书店走一趟。亲自在书架上选购书籍，是他的一大乐趣。他并不因为自己犯过教条主义错误而忌讳读书。他常说：“那不是读书的过错，而是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不对，书还是要读的。”他从北京带来肇庆的行李主要是书。他有严重眼疾，视力只有0.2了，但还要不停地读。他在肇庆牛岗的小屋里，习惯于伏案而写，临窗而思。

他虽然“流放”至粤西山区，被弃之一隅，但他心系党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他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每天都阅读多种报纸和收听广播。尽管那些“高举”、“突出”的陈词滥调连篇累牍，他还是用心看个究竟；尽管调子“左”得出奇，也还是洗耳恭听。肇庆市委编印的内部刊物《肇庆市通讯》，是他必读的参考资料，从中了解社会动态和工农业生产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列宁的名言成了他的座右铭。他不知多少回在牛岗山麓远眺重峦叠嶂而驻足沉思；又不知多少次在滨江堤上面对滔滔东去的江水而拄杖反诘。他担心洪水上涨侵袭肇庆人民的生命财

产，更担心像洪水猛兽般的政治逆流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张闻天在肇庆期间，发生两件既使他异常震动，又使他最为兴奋的政治事件：一是“九一三事件”；二是邓小平复出。

林彪是个人崇拜的狂热吹捧者，是党内极左路线的总代表。他的大树特树，名曰树毛泽东，实为树他自己。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的自取灭亡，客观地宣告了极左路线的破产。人们在惊愕之余，留下无尽的反思，也引起张闻天的无限感慨。他反复琢磨：“在社会主义的肌体内怎么会长出林彪这样的毒瘤；斯大林那样的个人迷信为何得以在六十年代的中国重演。”“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虽然尚未倒台，而且还在甚嚣尘上。但是张闻天相信真理，坚持正义。他常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于是促使他把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观点形诸笔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阐述自己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观点。

为了写好“肇庆文稿”，他不顾年老体弱，深入调查研究。经请示获准，他到了广东仪表厂、新华印刷厂、西区办事处、配件厂、家俱厂、钢铁厂、饼干厂、火柴厂、红旗大队等 20 多个单位调查研究，肇

庆稍有名气的企业，几乎都走遍了，有的还去过多次。他每到一处，都耐心听取干部职工的意见，不耻下问。从企业人数，干部职工的构成，产值利润，生产能力和销售，到原材料的供应和来源等等，都问得一清二楚，并一一记录下来。在当时突出政治，政治决定一切的形势下，他充分肯定干部职工坚守岗位，积极生产；在“四人帮”鼓吹“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社会物质紧缺，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他对单位领导说：“抓住了生产，就抓住了干部群众的心”；在社会生产不景，经济萧条的形势下，他鼓励大家大搞技术革新；在“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革命”进入家庭的时候，他了解西区办事处以户为单位，从事家庭手工业，使家务繁重的居民既可照顾家务，又可从事社会生产劳动时，他充分肯定这种做法，并鼓励他们说“要有计划地发展这类家庭工业，做到利国利厂又利家。”他在肇庆的深入调查研究，为他的“肇庆文稿”积累了大量素材。

1974年，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的复出，是他在肇庆期间最为兴奋的政治事件。他十分高兴地认为：“这是个好兆头”，并说：“小平同志敏锐、爽朗，解决问题果断，确实是个人才。”他充满着“我们党，我们国家可能有及早从迷宫走出来的希望。”

“九一三事件”使张闻天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而邓小平复出，又使他充满着希望。这一喜讯加速了年老多病的张闻天不遗余力，竭忠尽智地完成了“肇庆文稿”。如果说，林彪“九一三事件”自取灭亡，是张闻天“肇庆文稿”的启动器的话，那么，邓小平复出，则成为张闻天“肇庆文稿”的催化剂。

张闻天在长期深入调查研究，苦心孤诣，从1971年10月起动笔，至1975年8月离肇，秘密写下了近10万字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富于真知灼见的理论文稿，其中《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读书笔记）》、《社会主义的公私关系》等主要论著，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密切结合我国实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系统地批驳了指导“文革”的极左思潮和错误理论，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性质、任务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对经济建设的方针、党的领导、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等很多方面，都作了透切的分析，并对林彪、“四人帮”进行尖锐的、一针见血的批判。这些文稿，被史学界称之为“肇庆文稿”，并成为《张闻天文集》压卷之作。张闻天在肇庆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作出了努力。

张闻天 1975 年 8 月离肇时，把自己珍藏数十年的古籍《国史列传》共 20 册赠送给肇庆市委（现存端州区档案局），以表达他对肇庆人民的深情。张闻天离肇到无锡居住不到一年，于 1976 年 7 月 1 日病逝。他给肇庆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留下了珍贵的“肇庆文稿”，同时，给肇庆人民留下了既是革命理论家，又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光辉形象。他卒于“七一”，这是历史的巧合，恰好象征他的一生是为党奋斗的一生，为党献身的一生。

红旗在肇庆城区升起

——人民解放军解放肇庆前后

梁金明 张 慧

肇庆市中心城区——端州区，座落在美丽的七星湖畔，扼西江咽喉，是两广水陆要冲，亦是肇庆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在 1949 年解放前，称高要县肇庆镇，后为适应形势的发展，经历过高要县（肇庆镇）——肇庆市——端州区的变化过程。所以，今标题虽为“肇庆城区”，实际却是端州城区的解放史料。

一、南下大军解放肇庆

1949 年 4 月 2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指示和命令，横渡长江，穷歼敌寇，席卷江南。

根据中共中央解放华南地区的统一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